

watch | 上证观察家

中美经贸关系：美方应承担什么责任

□梅新育

规格空前首次中美战略对话已经在北京开幕了。不谈美国在中美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仅仅就中国在美国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而言,中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全世界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国债第二大外国持有人、多种初级产品世界最大进口国、全世界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这一切都要求美国拿出足够的精神来打理对华事务。

在这次对话开始的前几天,美国时间12月11日,保尔森发表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称他作为财政部长的工作重点是保持美国经济实力和长期竞争力,而发展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经贸关系,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相信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

美国宜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美国应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美国应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承担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义务。

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中国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尤其强烈。

中美战略对话是一个协商的机制,中美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协调,让双方决策者能够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冲突,本着责任义务合理分担、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则寻求解决办法,从而不仅给两国国民、而且给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商业环境。在《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保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3个方面的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促进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保尔森提出的这3个领域非常准确,这3个领域确实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我认为,在这3个方面,中国对美的要求应该包括:

——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有鉴于此,美国宜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在促进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中国“入世”之时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有权要求完全享受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而某些跨国巨头对市场无孔不入的控制和极不公平的限制性贸易惯例形成了全球范围企业领域最大的垄断,迫使中国企业陷入自相残杀的价格战,进而压缩了本应用于劳工工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制约这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

惯例,遏制、消除这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就是对竞争的最大促进。美国不少企业、不少地区也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但“山姆大叔”不能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化解双顺差问题,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横加干涉。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方面,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在寻求节约型发展模式、保护环境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明显的是,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能源进口国、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除非公开承认自己不愿意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应当在这些方面承担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义务。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某些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之所以能够持续生产,不是因为其生产者有污染的癖好,而是因为最终端的消费者提供了这样的需要,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从生产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从最终需求方才是治本之道,在这方面,美国显然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经济对话应在哪里交集

□沈飞翼

两个半月前,被认为是“中国通”的亨利·保尔森首次以美国财长身份访华,人民币兑美元应声冲破7.9。昨天,保尔森连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共同带领一个高规格代表团在北京开启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又立马登上7.8197新高。

然而,这次所谓的“保尔森效应”已不仅仅体现在汇率上了。保尔森行前一再跟美国企业打招呼,希望大家不要对他的具体成果抱太高期望,说白了就是不要对人民币升值持过高预期。而本次高级别对话探讨的三个议题,“保持持续增长而不出现巨大贸易不平衡,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领域开放市场,提高能源安全及改善环境”,则透露了更深层的信息。

归根结底,外汇储备膨胀的重要原因,还是国内高储蓄与国人投资工具和渠道的严重缺乏。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样一个判断: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货币改革不能代替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国居民家庭财富水平不高,经过这么多年的高储蓄,仍低于GDP的两倍。如何“藏富于民”,让人民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让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制度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让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与其国际地位相匹配,进而在国际经济博弈中能获得与其地位相当的话语权,是国人对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巨大企盼。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美方的对话者有了交集的地方。

就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来说,对话双方的关切也有交集之处。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中国制造”、“中国价格”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无所不在。但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相比美国、日本20%至30%的外贸依存度,中国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和外部冲击都很大,一旦美国经济衰退,中国经济难免陷入困境。所以,中美两个经济体之间如何互动是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

恰如摩根士丹利的斯蒂芬·罗奇所言,可能对中国增长造成障碍的唯一因素来自外部冲击,“以美国为主的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或华盛顿基于政治理由爆发的保护主义,都将是最大的风险。”对于尚未直接受过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而言,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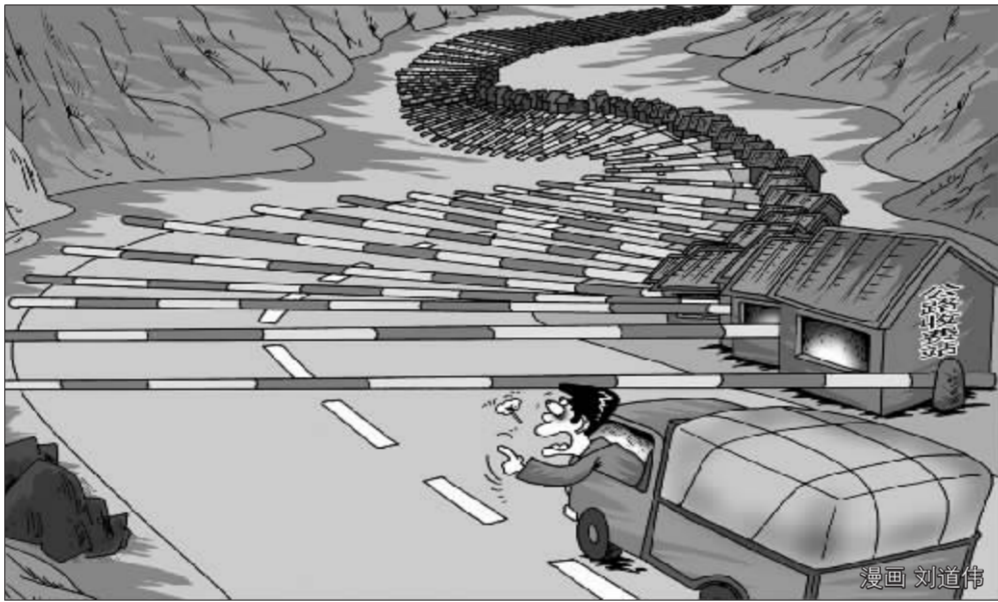
公路成为敛财工具制约经济发展

□陈军华

北京市人大代表赵仑发现:北京9条收费公路,全都是收费期长达25年甚至30年的经营性公路。其中,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建设资金为11.65亿元,从1993年开始收费。按目前的日均车流量,这条路从现在起,还能收60多亿元。加上1993年开始收的那部分,北京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有可能上百亿元!

公路带有天然的公益性,但是,在许多地方,收费公路成了敛财的工具,公益性特征几乎荡然无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收费期限长。比如,广东省河源江面收费站“还款期限达756年”。二是收费金额高。三是收费公路多。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建有收费公路的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建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约有10万公里在我国。

收费公路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有法不依。比如,该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年(西部为20年),经营性公路的收费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5年(西部为30年),但在现实中,“还款期限达756年”的收费站竟然也横空问世。而这些违法的做法,鲜有受到惩处的。



这种对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利用收费公路大肆敛财的做法,亵渎了法律,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它不仅大大提高了区域之间的物流成本,阻碍了区域间经济的互补,也严重影响了公路的利用率和运输效率,制约了旅游、运输等与交通行业密切相连的行业的发展。同时,从收费公路衍生出来了一系列腐败问题。

为了确保公路的公益性,在美国,政府始终是公路投资的主体。美国全国拥有89万公里高速公路,只有大约8000公里是收费路段,而且收费金额很低,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公路甚至连收费站都没有,但在我国,一些原本由政府投资的公路,在15年收费期限到来之前,政府也常常通过转让方式,将其摇身变为经营性收费公路。这种做法不仅是责任感丧失的表现,同时也是违法的。但是,由于相关信息不公开,这种故意延长收费时间,抹杀公路公益性特征的做法,常常游离于公众的监督之外,人们只能无奈地接受宰割。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对全国收费公路进行检查和审计,将相关信息公布于众,让公众更好地参与监督;对于那些已经还完贷款或已经达到收费期限的公路,应坚决停止其收费权;对于那些违规转让收费权的地方政府,应进行公示和处罚,并宣布其转让无效,逐渐使公路的公益性特征得以回归。同时,随着耐力的增强,政府理应当仁不让地成为公路的投资主体,以确保公路的公益性特征不扭曲,惠及民众,惠及我国经济发展。

“黄金十年”大讨论(7)

警惕未来经济增长制约因素

□加丽果

中国未来10年乃至20年GDP的增长速度要保持在7%-8%之间,这个观点是得到很多人的认同的,因此“黄金十年”的口号也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的。但是,中国要长期保持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从目前看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制约因素。

众所周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投资、消费、出口,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三驾马车在过去经济的增长中表现得相当出色,但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消费和出口这两驾马车的增速可能会有所受制。首先是出口,由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导致中国出口量的减少,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我们还只是发展中国

家,经济尚处在发展阶段。出口主要受制于人民币升值,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其次是消费,中国的银行存款一直居高不下,老百姓的消费难以刺激起来,跟中国的医疗、教育制度有缺陷密不可分。中国老百姓现在普遍有个说法:看病难,读书难,难在哪里?一个普通的感冒到医院就需要几百元。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利润化使得老百姓不敢大把大把的花钱,为的是以防万一。

再次是投资,如果上述两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有所减速,那么拉动经济增长,保持GDP在7%-8%之间的重任将无可厚非的落在投资这驾马车上。以投资刺激消费进而拉动经济

增长是最好不过的办法。但是,目前中国的投资存在固定资产投资过剩,资产泡沫有所加大。投资受制于投资过剩和加大投资的矛盾,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尽管存在着上述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但我们也应看到,任何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影响而拉动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就是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同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大民主政治的建设,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等等,都会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切实的保证。

全球化的中国：“黄金十年”不是梦

□胡飞雪

有些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观心态,熊市思维,他们对“黄金十年”的提法很不以为然。在下认为,“黄金十年”完全可以成为现实,主要理由至少有三:

一是中国已经完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刚刚庆祝了“入世”5周年,它的意义在于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全面、直接、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意味着中国经济步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踏上了更快速的运行轨道。中国经济自“入世”5年来,外贸营业额连年攀升,与欧盟的经贸额增加了5倍,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额,也保持年30%的增长率。中国全面入世后,这种高速增长势头仍将持续,中国未来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令人乐观。

二是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空前良好。美国财政部长称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领导国家,并且值得作为一个领袖来对待。”这

voice | 上证名记者

什么阻碍了内需拉动

□时寒冰

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然而,我们现在却残缺了一驾马车。过去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合计占到GDP总值的大约80%,并且仍在以每年25%到30%的速度增长。而消费则逐渐滑落。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

长期以来,在看待内需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误解,认为我国居民有钱不敢花。其依据是,我国居民储蓄余额不断创下新高,在今年3月份达到了16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事实与有关部门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

首先,自1998年之后,我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实际上是相对下降的,只有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是上升的。这些储蓄平均到13亿人身上,每个三口之家不过3万多元,在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未能健全的情况下,这点储蓄远期的担忧。更何况,在这些储蓄当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富人手中,一个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中国大约80%的储蓄是由20%的人拥有的。这样算来,绝大多数家庭的储蓄额实际上少得可怜。

而且,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与储蓄的情况相似,收入也是非常不均衡的,垄断行业的平均收入高到可

以超出其他行业的10倍左右。另有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均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平均下来,一年才提高5块多钱。

因而,我国内需拉不动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老百姓有钱不敢花,而在于他们手中的资金是有限的,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只是,16万亿元人民币储蓄额营造出的美丽光环,掩盖了真相。但是,有关部门更容易看到储蓄总量,而忽略了平均数额,正是基于这种错觉,有关部门高估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一些涉及民生的政策方面,陷入了一种误区。

为了促使居民消费,有关部门采用了“倒逼”的措施,逼着居民花钱。比如,前几年一些人倡导的所谓教育产业化,导致学费大幅上涨;所谓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导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其他,像房价、水、电、天然气、油价、邮政资费等等,无不在快速上涨。几乎每次上涨,相关负责人都会提到,上涨在公众承受范围之内。问题是,公众的承受范围有关部门是否真的搞清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尚且健全,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加重了民众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越来越不敢放心消费。不然的话,消费何以创下历史新高?

因而,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审视内需拉不动的真正原因,只有从老百姓“有钱不敢花”的错误认识中走出来,才能切身感受到房价及水、电等资源性价格持续上涨的风险之大,才能深刻体会到民生的疾苦,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那就是:想办法增加民众的收入,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打破垄断,阻止垄断企业通过转嫁成本不断涨价的行动。

点击 Blog

以成本为借口涨价难以服众

□贾必

12月13日,北京市发改委公告,拟于本月22日对调整北京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公开听证。根据调整方案,居民生活用气价格每立方米上调0.15元,涨幅7.9%,提价是由于上游气价调整使成本上升,另外本市天然气价格相对偏低等原因造成。

不仅天然气、水、电、成品油等价格的上涨,几乎都是打着成本的旗号展开的。道理很简单,既然成本可以通过涨价转嫁到公众身上,身处垄断地位的企业,哪一个还有降低成本的动力?不仅没有降低成本的动机,还有通过提高福利等待遇抬升成本的动机。

这不仅仅想到了美国的情况。有一个时期,美国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天然气行业改进了监管,引入并强化了竞争,竞争使相关企业效率大幅提

升,天然气价格大幅降低。调整后的天然气平均零售价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87年至1995年间下降了26%。显然,竞争是促使天然气价格趋于合理的根本因素。如果不引入竞争,单纯依靠成本定价只会使价格越涨越高。就在我们讨论天然气涨价的时候,美国天然气价格不断创出年内新低,据美国能源专家预测,到今年年底,美国天然气平均价格将跌破每加仑2美元。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时,有关方面无动于衷,现在却要调高天然气价格与国际接轨,在这种情况下,天然气上涨何以服众?

即便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的操作也存在瑕疵,我们天然气的成本为何如此之高,有没有垄断企业增加职工福利等因素?如果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动辄打出成本的旗帜涨价,只会纵容垄断企业变本加厉地转嫁成本,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节约费用等方式降低成本。

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思维。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无疑是“黄金十年”大牛市行情的关键因素,重要权重。

三是中国已经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战略。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分为三个层面,上层是政府主导的创新,政府投入资金引导科研机构、院校进行技术创新;中层是企业创新,凡进行自主创新的企业均会得到来自政府在税收、投资方面的支持;下层是个人创新,国家鼓励个人进行科研、发明创造。另外,中国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已相当完备,这为自主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法律支持。目前中国已经涌现了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如华为、中兴通讯、用友,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必将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盈利水平也会水涨船高,表现在证券市场,就是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提高,这正是沪深证券市场“黄金十年”的物质基础。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外部因素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内部因素是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一外一内因素的融合、互动,“黄金十年”将是可望也可即的前景。当然,既使在“黄金十年”的大牛市中,上帝也不会保证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定赚钱,要想赚钱,还需投资者本人具备相当的条件,这就是追求投资成功的热情,发现黄金的慧眼,顽强的学习能力,平常心,大局观,长线思维,正确的投资理念,有效的操盘策略等等。

“黄金十年”不是梦,对此我有99.99999%的信心。

“黄金十年”大讨论正在进行中,欢迎广大读者就感兴趣的话题继续来稿,文长千字左右即可。来稿专用信箱:zt@ssnews.com.cn